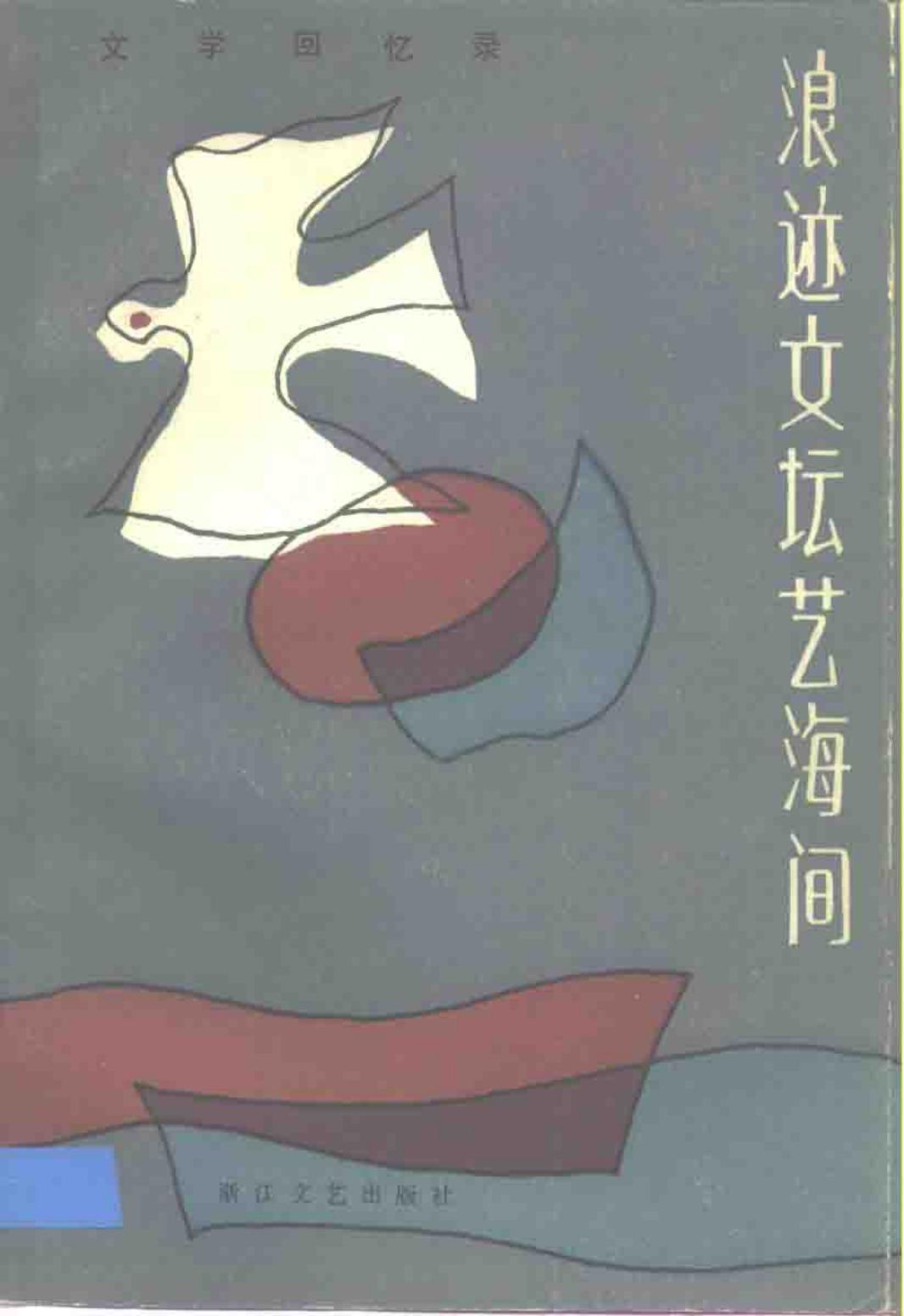


文 学 回 忆 录

浪迹文坛艺海间



新锐文艺出版社

文学回忆录

浪迹文坛艺海间

吴似鸿

费淑芬整理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方 贲
责任编辑 李均生

漫述文坛艺海间

吴似鸿

费淑芬 整理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印校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龙驹西路)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3 字数177,000 印数00,001—7,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123

定 价：0.8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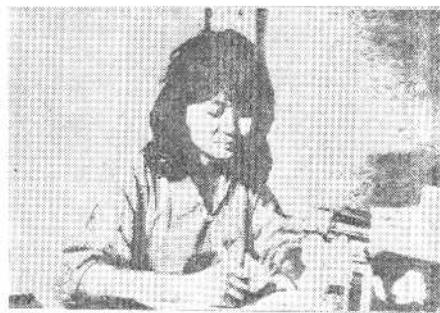
吴似鸿近影



▲1931年吴似鸿于杭州



▲1964年吴似鸿于蒋光慈墓前



▲创作《毛姑娘》时的吴似鸿



1930年吴似鸿在话剧《卡门》中饰舞女▶

目 次

一	“又是一个囡！”	1
二	人、手、足、刀、尺	3
三	中了“女状元”	5
四	在绍兴女师	7
五	北伐军来到绍兴	8
六	谁来当校长？	9
七	有了被打倒的资格	11
八	单恋	13
九	黑衣黑裙到杭州	15
十	离开了故乡	17
+ 一	来到上海开明书店	19
+ 二	我成了大学生	25
+ 三	进了南国社	27
+ 四	南国社的演出活动	30
+ 五	日记换来了大饼	32
+ 六	不为国民党做事	35
+ 七	回乡奔父丧	37
+ 八	《南归》的风波	38
+ 九	“南国”情深	41
二 十	在男性包围中	43

二十一	认识了蒋光慈	45
二十二	结 合	47
二十三	家庭生活	51
二十四	怀念集体生活	54
二十五	在万宜坊的日子	56
二十六	走访胡也频与丁玲	59
二十七	蒋光慈的“退党”	60
二十八	患难伴侣	62
二十九	三易住所	65
三十	两地分居	68
三十一	一丝凄然的微笑	72
三十二	他要光明，他要太阳	74
三十三	光慈死去了	76
三十四	孤苦更加贫病	79
三十五	病中乡居	82
三十六	玛利亚和男孩子	85
三十七	“美联”遭破坏以后	87
三十八	我不是“墙头草”	89
三十九	绵绵情思	92
四十	我有了孩子	94
四十一	“弥月”之后	97
四十二	我需要的是爱情	99
四十三	孩子真正失去了父亲	101
四十四	流浪妇	103
四十五	又一个人闯进了我的生活	105
四十六	妇女运动	108

四十七	理想的家庭	110
四十八	参加鲁迅的葬礼	112
四十九	北上劳军	114
五十	被困北平城	119
五十一	救国会的临时工	123
五十二	他是一个托派	125
五十三	他走了	127
五十四	株 连	130
五十五	到了香港	132
五十六	寻找抗日的军队	135
五十七	他们不抗日	139
五十八	在孝丰深山里	143
五十九	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	145
六十	离开这鸟七八糟的地方	150
六十一	逃亡者	152
六十二	第二次到香港	154
六十三	我有亲人，我有朋友	156
六十四	我不愿走那条路	160
六十五	我要回内地去	164
六十六	从香港到桂林	167
六十七	孤儿苦	170
六十八	文化城中文化人	173
六十九	“文化委员会”	175
七十	撤退路上	178
七十一	同是天涯沦落人	182
七十二	初到重庆	186

七十三	周总理派人送钱来	190
七十四	山城探旧友	193
七十五	从流荡到穴居	199
七十六	土地和张家花园	202
七十七	在白色恐怖中	206
七十八	黎明之前	210
七十九	痛苦的结合	215
八 十	迎来了解放	217
八十一	回到浙江来	220
八十二	最后一次见面	222
八十三	一个落泊者还乡	226
八十四	故地寻师	228
八十五	“呆婆”	230
八十六	莫须有	232
八十七	充实的生活	235
八十八	“南国”同人叙旧	237
八十九	两封老友的信	238
九 十	乌云压顶的时候	242
九十一	我又回到文艺界	246

一 “又是一个囡！”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三岁了。我上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旧社会重男轻女，特别是在我的上面有过一个小哥哥，据说生得五官端正，相貌很好，可是不到满月就死了。我父亲是个当铺的伙计，他看不起自己的职业，又嫌上面的两个哥哥无能，只盼着再生个儿子，将来能出人头地。母亲怀我的时候，父亲寄予很大的希望。不料待我生下地时，父亲一看却是个女的，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又是一个囡！”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又找来了算命的书，给我排“八字”，说我“八字”很凶：在家克父克母，出嫁克夫克子，所以更不喜欢我。平日对我讲话，总没有好声气，正因为这样，母亲就特别疼爱我，我吃奶一直吃到四岁。

这样的环境，倒也锻炼了我，我自小个性就十分倔强。记得大概是七岁的时候吧！父亲在房间里画画，我在一旁看着。闲着没事，就把手里拿着的裁纸刀在桌沿上咕叽咕叽地锯着。父亲抬头见了，一把夺过我手里的裁纸刀：“你烦，你烦！”掉转刀柄在我肩上敲了两下。我身上穿的是棉衣，并不感到怎么痛，但是我感到受了莫大的委屈，便放声嚎啕起来，一直哭到大门外边，父亲说好说歹都制止不住。后来还是邻居正妈妈把我抱了起来说：“哪个敢打我们罗姑娘？快别哭了，我抱你去看四相①。”此后有三年之久我没有叫过一声父亲。后来还是母亲说：“阿罗，爸爸总要叫的呀！是爸爸养活你的呀！”我没

①看四相，绍兴方言，即到外面去看看、玩玩的意思。

奈何，才开口叫了一声“爸爸”。倒是从此以后，父亲对我不象以前那么凶了。

我从小就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玩，五、六岁的时候，就和村里的孩子一起上山拾枯柴，采野栗；还下田去拾田螺，捉蚱蜢。男孩子们脱了衣服跳到河里捉鱼虾，我也脱了衣服跟他们跳下去。邻居们看了，背后骂：“真是个野姑娘，一点都不怕难为情。”但是她们当面并不说，我自己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母亲怕父亲骂我，所以经常在父亲面前讲我的好话：说我勤快，说我顾家，样样东西都拿回来。这样，时间长了，父亲的态度也渐渐有了转变，有时给我一个苹果，有时给我一只桔子。我受到了这种犒赏，对父亲的感情也慢慢好了起来，觉得他有时候也还是喜欢我的。

其实我父亲也并不是个顽固凶蛮的人。辛亥革命时，他就把辫子剪掉了，后来又把两个哥哥送进学校读书。那时大姐早已出嫁，她是一字不识的；二姐在秋瑾办的明道女学读书；三姐也进了本地的小学。父亲很敬佩秋瑾，常常讲秋瑾的事迹给我们姐妹听。

我的三姐名叫似玉，就在本乡进修小学读书，十四岁那年，不知是得了一种什么病死去了，乡下人便说是学校里的体操课把身体操坏了。从此，父母亲再也不肯送我到小学里去读书，而是把我送进了一个私塾，同时也因为我太野了，想要私塾来磨磨我的野性。

二 人、手、足、刀、尺

进私塾那年我已经九岁了。记得那一天，母亲在灶司菩萨面前点起香烛，叫我背起书包向灶前三鞠躬，然后又到祖宗牌位前三鞠躬，再送我到书房，见了老师，又是三鞠躬。

这个私塾老师，是我一个远房的堂兄，这时已六十多岁了。因为两腿瘫痪，行走困难，每天要女儿搀扶他到书房里来。来了之后，就坐在上方，象一尊菩萨，从来不露笑容。桌面上摊着一本线装书，一方砚台，一个笔架，旁边还有一支戒尺，谁要是背不出书，就得老老实实地把手伸出来，让老师打手心。

父亲给我选的是小学课本，开头一课便是“人、手、足、刀、尺”，整个上午，翻来复去就是读这五个字，中间也没有休息。我向来是动惯了的人，要我这样坐着不动，真比什么都难过，因此只好坐着抖动两条腿。形成了习惯，直到现在都改不过来。

在私塾里关了两年，小学校里女学生停止体操课了，父亲才把我送进进修小学。那时小学的课本仍是文言文，什么“人生于世，不可不读书”等，我对此不感兴趣，作文也写不好。有一天，一个同学把我帽子上的绒球摘去了，我要他赔，他逃走了，我就追他，恰好被老师撞见了，就罚我们两人都立壁角，直到放学很久了，才放我们回去吃午饭。我觉得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就惩罚人，心里不服，对学校失去了兴趣。每天吃过早饭，母亲看我背着书包出门，以为我上学去了，其实我却在邻居家玩。有时母亲发现了，就拿根竹梢在后面赶，才勉强把我

赶进学校。

到了三年级，我索性不上学了。看邻家姑娘挑花边一个月能赚不少钱，我也去领了些花边来挑。谁知辛辛苦苦做了三个月，交货后只得到十六只银角子。我想，要靠这个来养活自己是困难的，还不如读书，将来可以当个老师，也就可以养活自己了。

重新入学以后，我比过去用功得多了。那时的课本已改成白话文，象讲话一样，我听得懂，也有了兴趣。和同学们一起荡秋千、踢毽子，有时还和男同学去打篮球。我爱上了学校生活，老师也渐渐地喜欢我了。

到读五年级的时候，我身体开始发育。我的二嫂对我说：“妹妹，你该穿小背心了，胸脯大出来，难看的！”她给我做了一件紧身背心。一天，我穿了紧身背心上学去，被校长钱颐素老师看见了，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却转身去拿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出来。翻开书，指着一篇文章叫我看。原来这是一篇谈有关妇女束胸问题的文章，里面列举了妇女束胸的许多害处。从此，任凭别人如何议论劝说，我再也不穿小背心了。

还有一次，二哥给二嫂买了一瓶香水，二嫂洒了几滴在我身上，我上学时，给钱老师嗅出来了。他对我说：“你身上洒了香水，身上是香了；可是有没有去想想人格怎么样呢？”经他这么一说，我以后就没有再用过香水。

钱老师不但关心我的功课，更加关心我的品德，他常常教育我要有独立的人格，不要依赖别人，要求得平等、自由。那时，我正处于可塑性很强的青少年时期，钱老师的话，我十分听得进，并且在我以后的生活道路上，一直起着指导作用。

为了磨砺自己，我在天气很冷时仍不穿棉衣。晚上做功课，母亲把棉衣披在我身上，我故意甩掉。平时，也有意使自己吃苦，读书也十分用功。

到小学最后一学期时，我的成绩已名列前茅，毕业考试，我得了第一名。在毕业典礼上，老师要我代表毕业生讲话。我对家长和来宾讲：“我将来要为社会服务，要为国家出力！”赢得了全场热烈的鼓掌。

三 中了“女状元”

小学毕了业，我想升中学，可是父亲却负担不起了。他说：“你两个哥哥，小学都没有毕业，现在，我已经让你读完了小学，再要读上去，我实在没有力量。你能写写信，算算帐也就好了，还想要怎样呢？”

我去求堂哥代我向父亲说情，堂哥向父亲说了，仍旧不答应。我只好又去告诉钱老师，请他给我想办法。钱老师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女儿是值得培植的，要是经济困难，可以让她去读师范。师范生是县政府供给一半伙食费，自己每月只要再交一元五角就可以了，在家里总也要吃饭的，书籍费和学杂费我代她付。师范是培养教师的，毕业出来就可以教书，不愁没有工作。”

这样，父亲才同意我去升学。钱老师把我带到绍兴城里，就住在他家里，晚上我和钱师母一起睡。

钱老师给我在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报了名，考试那天，又亲自送我去应考。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明道女学，秋瑾牺牲后

是为纪念她而办的，后改为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来这里应考的，绝大部分是城里的女孩子，只有我一个乡下姑娘。

第一堂是考国文，要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女子的前途》。第二堂考的是数学，其中有一道题是：七个七是多少？这却把我难住了。我在纸上划了七个七划，然后再一二三四地数下来，最后数到四十九。答数是对的，但是我却忘记了七七四十九这个简单的口诀，枉费了那么多工夫。第三堂是口试，由校长朱少卿亲自主考。他立在讲台上一个一个问，问到我的时候，他说：“这次来应考的学生有百来个，我们只录取三十名，如果你不能读到毕业，那就不要占去这个名额。”我回答说：“我自己的志愿当然是想读毕业的，但如果以后发生突然变化，那我是无法预知的。”校长点点头说：“这个姑娘有见识，回答得很好！”

学校发榜，我被录取在第四名，钱颐素老师竟比我自己还高兴。他对别人说：“我们是农村小学，似鸿同城市同学一起考，竟考了第四名，真不容易！”他还陪我去拍了一张照片，十分兴奋地在照片上题了一首诗：

花羨丰姿水羨神，绿荫深处展天真，

文章美学推双绝，三五余年信可人。

我回家去取铺盖行李，一跨进堂屋，只见墙上贴着一张黄纸红字的喜报。上面写着：“贵府千金吴似鸿，进城考举，考中女状元，特来报喜！”我不由得大笑起来，科举制度已废除多年，哪里来的状元？再说，女师是一所中等学校，考取了顶多算个秀才，哪里能是状元呢？

母亲从里屋出来，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有一个人

敲锣进来贴了这张大喜报，我还赏了他一块大洋哩！”

四 在 绍 兴 女 师

绍兴女师校长朱少卿，是日本留学生，国民党左派。他曾说：“我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他请来的教师，大多思想进步，有的还是共产党员。他们常常公开向学生宣传共产主义。那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的活动是公开的。

这一时期学校里的政治生活十分活跃，除了进步老师给我们灌输一些革命道理之外，还从外面请人来讲课。我记得陈望道先生就曾从上海专程到绍兴，讲了《妇女与新文化》。

同学中也有很多思想进步的，有一个叫王若真的，是秋瑾烈士的侄女，她和另几个同学都是共产党员；有一对姓沈的姐妹，还被保送到苏联去留学。

学校领导很支持学生参加校外活动，如逢“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老师就带我们到大善寺广场参加群众大会。因为我来自农村，力气大，老师总是叫我扛大旗。“五卅惨案”后，老师组织我们到农村募捐，支援上海罢工的工人；“五九”国耻节，又组织我们到洋货店搜查日货。我很喜欢参加这些活动。

在功课方面，我比较爱好国文、图画、唱歌、跳舞。还常常在下课之后，独自背着画袋去野外写生。学校里有什么文艺活动，也总少不了我。记得有一次演出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同学汪曼之扮聂政的姐姐聂嫈，我扮聂政。这个剧本写的

是战国时代的故事，我们没有战国时代的服装，就穿现代服装，聂嫈穿短衣短裙，聂政穿白衬衫、西装裤，我们演得很卖力，同学们也看得津津有味。

五 北伐军来到绍兴

一九二六年寒假，我回到家中，独自住一个房间，有一天半夜里，我睡得正熟，突然被隆隆的炮声惊醒，母亲跑来对我说：“似鸿，听说城里打仗了，你不要害怕。”

我倒没有感到害怕，但是心头却不能平静。第二天刚亮，我就跑进城去了。跑进学校，同学、老师一个都不见，只有几个校工在那里。他们告诉我：“北伐军到绍兴了，老师们都到县党部去了。”我立刻跑到县党部，果然，很多老师、同学都在那里。

同学任昌瑞正在那里写标语，见了我就一把拉住，叫我一起写。不一会，王若真背着背包走进来，这时，她已是绍兴女工的领导者了；另一个同学黄超裳，是学生联合会的干部；而校长朱少卿，已到杭州当教育厅厅长去了。

一个穿军装的男人把我叫进他住的房间，问我：“你说，这个社会平等不平等？”我回答说：“不平等，富的很富，穷的太穷。”他说：“你说对了。要社会平等，就应当革命！”说着，把我叫到房外，拿起一支挂着红色穗子的手枪，教我开枪。我一见枪，吓得连忙缩回了手，碰也不敢碰一下。他一看我不是一个可以打仗的武士，感到很失望，便叫我去写标语了。

绍兴要组织妇女协进会，王若真要我担任协进会会长，我